

從溫和到開明

——一個觀念的變正

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丁邦新博士在聯合報副刊發表〈一個中國人的想法〉之後，蕭新煌教授在自立副刊發表了〈從一個小市民到兩個中國人〉，將丁文和十五年前孤影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作了有趣的比較。蕭教授以社會學者的眼光，清楚地觀察到由「頗具攻擊性」的極端保守主義演變到「沒有攻擊性」的溫和保守主義的軌跡，最後下了一個結論說：

「回想這過去十五年台灣社會所經歷的種種變革，我不禁感到慶幸。」

巧的是，一百六十五天之後的九月二十一日，關關博士在最具鄉土性的自立副刊發表了〈方言、國語、外語——一個觀念的辯證〉，使我們清楚的觀察到「溫和的保守主義」又演變成「開明的保守主義」的軌跡。

丁邦新博士關心的只是一個抽象的大中國，因此認為「方言」只能在「家庭和同鄉會中使用」，但關關博士以戰後出生於台灣的外省人第二代自然培育的土地感情，把眼光落實到台灣本土的人

民、語言、文化。

他認為語言無「雅俗之別」、「電視上不宜再出現模倣『台灣國語』的有意動作或無心動作，也不宜丑化或醜化台語。這麼做只會加深彼此之間的裂痕。」

他又認為『台語小說』也不必加以排斥。在作品中偶爾加個『稽查某』、『囡仔仙』或『水噹噹』等字眼只會增加文學趣味，不會『動搖國本』。

最後他建議「大一統中國主義者」「愛中國先愛台灣」——「包括台灣的土地、人民、文化以及台灣本土的語言」。

由這上引的關文，我們不但清楚地觀察到保守主義由極端的、溫和的，演變到開明的軌跡，也觀察到由外省人第一代的「大外省主義」（借用關語）演變到外省人第二代的「台灣本土化」的「一個觀念的變正」。由孤影到丁邦新經過了十五年，但由丁邦新到關關，只需一百六十五天。保守主義者態度的開明化，觀念的「變正」，速度如此之快，不禁令人慶幸。

但是綜觀關文，我們仍然不得不感到關關博士的保守心態還是太過濃厚。這使人懷疑他的開明態度是不是迫於形勢而不得已表現的風度。

關博士的「保守」，並不是要保守文化傳統，而是保守「國家主義」的傳統。「國家主義」並不是中國文化的傳統，而是近代中國的新傳統。「國家主義」的觀念乃源於近代後進國家在先進國家的壓迫下急欲富國強兵所產生的病態心理，只有當國家進步到和先進國家並駕齊驅時，這種病

態心理才能自然痊癒。無論大陸或台灣，無論統派或獨派，多多少少都會染上不同形式的「國家主義」病態心理，只是程度和認同對象的區別而已。因此在中國仍處於落後的階段，要求每一個人都放棄國家主義的觀念是很難的。尤其在台灣，長期處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思想教育下，對於國民思想的偏差，實難過責。

不過，「國家主義」既然是一種病態心理下產生的病態觀念，我們就不能再越陷越深，必須早日覺醒。否則遲早會發生德國、意大利、日本的法西斯主義，這是我們不能不憂慮的。

關博士的國家主義保守心態，可以從下面的主張看出來。比如他說：

「『台語文字化』中的『台語』……如果包括台灣本土的三種方言，則『台語文字化』勢必出現三種不同的文字系統，這麼一來，問題就要嚴重多了。」

「如果『台文』將取代『中文』的知識體系，可能會引起學術界的極力對抗，此點不可不慎。……目前若有『台語文字化』運動，則只應該在『文學』而非『知識』範圍內展現其『多樣性』。」的確，『母語』是非常重要的，不容輕易『抹煞』的。然而，我們若能往深處想一想；就會發覺：母語並不等於母親。我們與母親的關係是血緣的，永遠無法改變的。我們與『母語』的關係是後天的、可以改變的。……語言具有『團結力』，但也具有『排他性』。有理智的人應該做語言的主人，而非語言的奴僕。」

由上引可知，關博士的「風度」雖然進步了，但他的「心態」依然十分保守。他把語言的統

一看成和國家統一是一回事。

他認為方言與國語之間具有一種排斥性，無法共存共榮，如果在鄉土文學中參入一些台語詞，那還不至於「動搖國本」，如果進一步「文字化」，甚至發展到知識領域，那就會「動搖國本」。

這是一般「開明的保守主義者」普遍具有的心態。他們不主張霸道地消滅「方言」，而主張王道地限制「方言」的發展，令其自生自滅。最後，使語言歸於統一。手段雖有不同，目的則殊途同歸。

我想要「辯證」的是：

1. 讓「方言」提昇到和「國語」一樣的地位，使「方言」文字和「國語」白話文一樣地可以充份描寫自然語言，並隨著時代進步其語言文字，真的會「動搖國本」嗎？

一位加拿大語言學家調查一百個國家一百年的語言發展，證明語文的歧異或語文的統一和國家的進步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學者常舉瑞士為例，說瑞士有四種不同的官定語文，仍然是一個進步的國家。瑞士不但進步，甚至各語族之間由於互相尊重、互相欣賞，並沒有產生任何不安。

由此可見，語文本身並沒有什麼「排他性」，更不會「動搖國本」。語文之發生問題，乃是由於人們對於語文的態度。有壓迫的地方便有反抗，當一個語族壓迫另一語族的語文時，被壓迫的一方爲了生存必然會採取自救之道，如果這種「自力救濟」無法得到完滿解決時，一定會變成不安的因素。因此語言發生問題，應該反省的是壓迫者，而非語言本身有問題；對待語言問題應該

更開放，而非繼續保守，甚至加強其壓迫。

2. 語文的使用與研究的本身是中性的，不必與政治發生關係，可是當語文的使用與研究受到壓迫時，被壓迫的語文爲了生存而訴諸自救行動，如要求雙語服務、雙語教育時，它自然會變成一種政治活動。在語文壓迫成爲事實的情況下，要求語言問題不要政治化，就不免偏袒了。而關博士一方面呼籲「民進黨不要介入語言問題」，一方面又故意對「雙語教學」避而不論，顯然希望保守台灣的語言現況中「國語」的優勢，疑懼「方言」的抬頭。

3. 關博士疑懼的，不止是台語的文字化，甚至疑懼台語廣播。他「關切」康寧祥申請設立廣播電台，恐怕會以語言爲傳播媒介，直接將「地方意識」，傳播到「方言聽衆」的耳朵裡。疑懼保守的心態較之執政黨有過之而無不及，令人驚訝。國民黨自來就有一個黨營的中廣，其第二台一開始便使用台語廣播至今，現在又要開放電視方言時間的限制。而關博士在康寧祥申請廣播電台尙未有眉目的時候，便表現得如此的疑懼，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4. 所謂「母語」其實並非「媽媽教的話」，而是民族的語言。一個人以某族的語言爲母語時，便等於認同該民族。我常說母語是民族的「姓」，當姓氏改變時，日子一久我們便無法追蹤他的宗族所屬；因此當母語改變時，我們便無法知道他的民族歸屬。所以台灣人常罵那些不會說台灣話的台灣人「背祖」，理由在此。現在有些鶴佬人不會講鶴佬話，也有客家人不會講客家話，山地人不會講山地話，我認爲他們可以是台灣人，但不能再承認其爲鶴佬人、客家人或山地人。因爲他

們已經「背祖」了。這些台灣人即使現在仍然自稱某某族，但再過幾代，必然不會再認同原來的族，而認同台灣新的「國語族」。這種前例指不勝屈，如平埔族改說鶴佬語之後，便認同於台灣鶴佬族，不自認和山地人同種。越、閩、粵三族，原是古越族，後來改用漢語，便自以爲是漢族。閩南人又自稱「鶴佬人」，「鶴佬」二字的本字是「貉獠」，這原是漢人對閩人的蔑稱，因爲民族認同的改變，便以爲是「河洛」二字的音轉，說「河洛人」是中原人的後裔。如果，荷蘭人據台至今，大家都改說荷蘭話，說不定有人會以爲「鶴佬」二字是「荷蘭」二字的音轉哩。

由此可見，改變母語和改變姓氏一樣，都是背祖的行爲。民族被同化，正如小孩被賣爲養子女而改姓一樣，在我們傳統的觀念裡，這不是光榮的事。但是關博士說「母語可以改變」，而且那是「有理智的人」做了「語言的主人」。

關博士似乎是在讚美那些不會說台灣話的台灣人是「有理智的人」、是「語言的主人」，反之那些堅持說母語的是「沒有理智的人」、是「語言的奴僕」。

關先生反駁一些「本土派」的學者主張「入境問俗論」，責難外省人不肯學說台語（按筆者曾著文評丁邦新博士，題爲〈入境隨俗、落地生根〉，語本台諺「入港隨彎、入鄉隨俗」。我是說「隨俗」不止是「問俗」，問俗只做到「知」，隨俗則是「行」是具有優越感。他說外省人是「集體入境」，而不是來台旅遊、採訪、移民（？）的小群人，所以不必「入境隨俗」。

其實，旅遊、採訪之類，只需做到「問俗」，不必「隨俗」。外省人「集體入境」是移民行爲，

如果不願「隨俗」，有可能是由於具有「優越感」。正如當時閩粵人入台不願隨「番俗」、日本人據台不願隨「漢俗」，反而要改變台灣人習俗一樣，是出於一種「優越感」。而關先生竟然顛倒是非地說「入境問俗論」是台灣人具有優越感。左思右想實在想不通關先生的邏輯。

關博士知道外省人原來都說「方言」，來台之後才改以「國語」為母語的，這原是不得已的事，是情勢所逼的。而關博士卻賦予價值判斷，說這是「有理智的人，做了語言的主人」。把外省人「背祖」的事崇高化，並且要拖台灣人下水，同歸於盡。

其實我們從事母語運動，只是要求文化繼承權、文化教育權，希望我們下一代以傳統台灣文化為基礎，發展新文化，對多采多姿的人類文化做出貢獻，並不是要和中國對抗，和「國語」對抗。

在外來文化未侵入時，傳統文化沒有威脅，所以文字不一定是文化傳承的必要工具。但自日據以來，台灣各族人同時失去了文化繼承權和教育權，傳統文化受到威脅，正到了民族存亡之秋，所以才有一九三〇年代的「台灣話文運動」。光復以後，「國語運動」如火如荼展開，幾有消滅台語之勢，我們再度感受到救亡圖存的必要，因此興起「台語文字化運動」，這是出於基本人權的維護。

而關博士卻搬出英語的威脅，想把注意力轉向「外患」，說：

「在台灣地區，不止方言受到國語的『威脅』，國語也同樣受到英語的『威脅』……兩者都可

說是處在『同病相憐』的地位，『相煎』何太急呢？

誰要「煎」國語？要求母語和國語「平等」，要求「國語」不要再壓迫「母語」，這是「相煎」嗎？請問關博士的話從何說起？

關博士又誤以為「母語文字化運動」是要人「只懂方言不懂國語，只懂國語不懂外語」。然後說教說：「懂得語言愈多，我們的『世界』也就愈大。從事群眾運動的政治人物，如果只想把群眾帶入『小世界』，等於害了他們，剝奪了他們瞭（應作「了」）解『多元世界』的權利。」

要我們的子孫多了解一點傳統語言文化，是要把他們帶入「小世界」？使他們變成井底之蛙？這話又從何說起？

我以為「民族主義」如果是健康的發展是值得讚許或贊成的，可是如果變成病態的「國家主義」，就會變成對外侵略、對內壓制——以大民族壓制小民族，以中央壓制地方——的狹隘、恐怖思想。在開放呼聲日高的今天，保守主義心態應該揚棄，而不止是表現「開明」的風度而已。

（原載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六日《自立晚報》副刊）